

共和国故事

冲破封锁

粉碎美国指使台湾对大陆封锁禁运

陈忠杰 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破封锁:粉碎美国指使台湾对大陆封锁禁运/陈忠杰编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2
(共和国故事)
ISBN 978-7-5463-1866-0

I.①冲… II.①陈…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I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690 号

冲破封锁:粉碎美国指使台湾对大陆封锁禁运

编写 陈忠杰

责编 刘野 祖航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8 字数 69千

书号 ISBN 978-7-5463-1866-0

定价 22.00元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18720

传真 0431—85618721

电子邮箱 sxwh00110@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退换

前 言

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同已走过了 60 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 年是短暂的，但这 60 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 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 60 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 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

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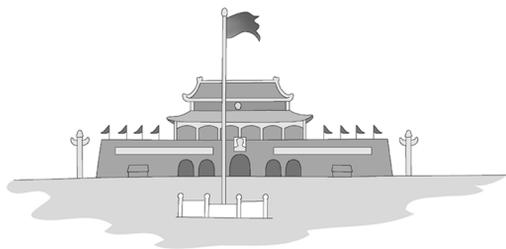
《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重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

2010年1月



目录

一、突破海上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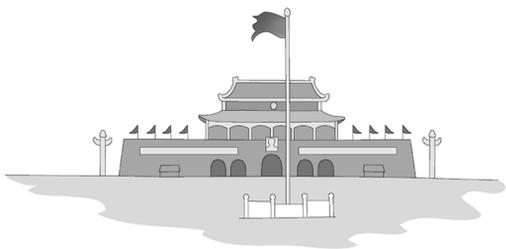
- 新中国面临海上封锁/002
- 周恩来命令打通珠江口/010
- 叶剑英给洪学智交任务/013
- 海军顺利打通珠江航道/018
- 周恩来命令打通长江口/022
- 陈毅令张爱萍加快扫雷/025
- 扫雷失利商船多次触雷/030
- 荣毅仁建议不要封港/034
- 长江口扫雷爆破成功/037
- 陈毅进行反封锁斗争/042

二、打破贸易禁运

- 新中国面临禁运威胁/048
- 新中国展开反禁运斗争/053
- 陈云提出反禁运的对策/056
- 毛泽东关心前线物资/059
- 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064
- 叶剑英指挥种植橡胶树/067



目录



陈云化解棉花禁运危急/072

号召海外华侨反禁运/075

新中国积极同各国贸易/078

三、港澳秘密支援

充分利用港澳突破禁运/082

霍英东给南光运送柴油/087

霍英东冒险运送钢管/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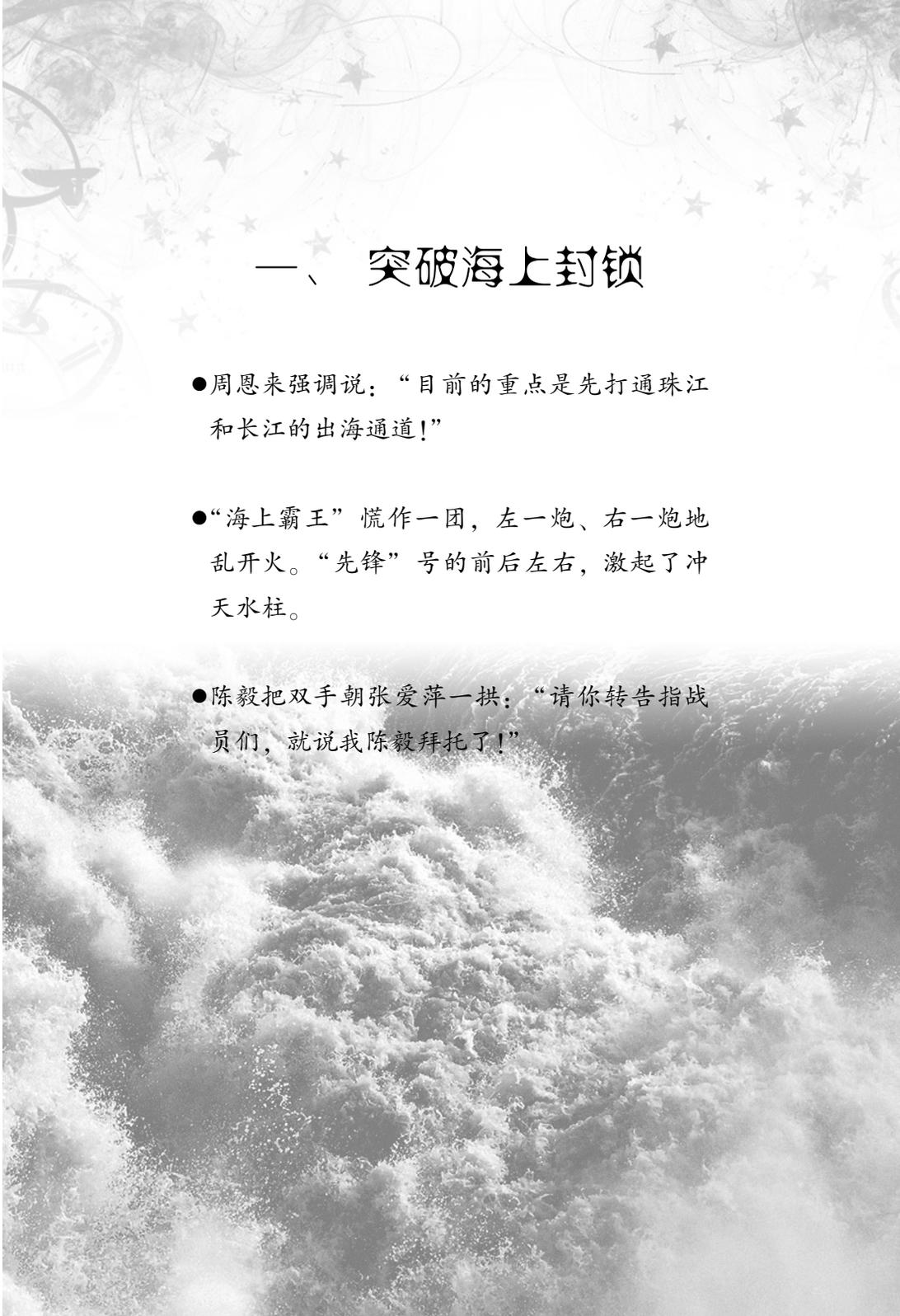
霍英东组织秘密运输/095

霍英东亲自指挥运输/098

霍英东巧妙躲避英舰艇/103

霍英东登上港英巡逻车/108

霍英东忍痛运输货物/114



一、突破海上封锁

-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的重点是先打通珠江和长江的出海通道！”
 - “海上霸王”慌作一团，左一炮、右一炮地乱开火。“先锋”号的前后左右，激起了冲天水柱。
 - 陈毅把双手朝张爱萍一拱：“请你转告指战员们，就说我陈毅拜托了！”
- 

新中国面临海上封锁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国民党军队向台湾和舟山等沿海岛屿撤退。由于我军没有海、空军和缺乏海上作战经验，10月26日，金门登陆战受挫。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转守为攻，依靠海、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

国民党统帅部制订了反攻大陆方案：以台湾、舟山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为了遏制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准备卷土重来，蒋介石开始了“闭港政策”。依据这个计划，舟山岛国民党军开始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破坏。

国民党封锁了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其中包括秦皇岛、天津、永嘉、宁波、上海等重要口岸的沿海区域。并向全世界宣布：在上述海区“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

随着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台湾当局实施海上“闭港”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凡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沿海港口、近海航道和岛屿都实施封锁。

美国对台湾当局的“闭港政策”从默认到公开支持。尽管美国的商船也遭到过袭击和截留，但美国政府依然

从“大局”出发，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台湾当局。

就这样，国民党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没收与大陆通商的货物。重点查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并巡逻台湾海峡。

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4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

有媒体就报道了，国民党军队阻止外国商船同新中国进行贸易的例子：

1949年11月下旬，英国“宁海”号、“怡生”号等7艘商船，在英国远东舰队驱逐舰队长杰伊率领的“黑天鹅”号、“布里迪斯贝”号、“蒙茨贝”号等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到达长江口，试图进入上海港。

11月24日，当船队航行到长江口外九段沙灯标水域时，遭台海军“太康”号、“永泰”号两艘军舰的拦截，英船被迫停航。

随后，台海军“太和”号和“太平”号两舰也在第一舰队司令刘广凯率领下赶到。4艘军舰在英舰上游2000码处一字排开，拉开作战架

势。英舰也不示弱，将所有炮口对准台湾军舰……

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在关键时刻，杰伊向刘广凯提出质疑。

刘广凯声称：

“台湾海军舰队奉令执行关闭港口任务，任何出入长江口的船只，绝对无权擅自放行。英舰队应立即呈报英国政府向台湾当局交涉，由正式外交途径解决。”

杰伊无奈，只好向远东舰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在等待上峰命令期间，英方一方面做好战斗准备，一方面让3位商船船长出面直接与刘广凯交涉。

11月27日，船长们登上“太和”号，直接与刘广凯面谈。

船长们首先质问：“我等奉各公司之命，满载客货驶往上海，为何不许我们进港？”

刘广凯答道：“我军奉令执行关闭港口政策，任何船只无命令均不得出入。”

船长们指出：“贵海军一定要阻止我们英国商船去上海经商，恐怕要引起英国政府从速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如果英政府真正承认了中共政权，那么贵海军在国际上就失去了地位，那岂不变成海盗了吗！”



刘广凯声称：“本人只知就军事上的观点就事论事，未奉命令就不能准你们去上海，至于英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与否，这是属于英国外交政策问题。”

双方的谈话最终不欢而散。就这样，台英双方互不相让，僵局持续了3天之久。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商船“富兰克林”号自长江口外驶来，不听台海军的警告，强行疾驶进入长江口，台军舰鸣炮示警，该船毫不理会，台军舰瞄准射击，几乎将其击沉，但该船还是勉强驶入上海港。

见此情景，英舰队为避免发生海战，于27日中午主动退出长江口。

英国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于12月24日继续在长江口布雷。

据统计，从1949年6月至12月，仅半年时间，台海军就向长江口派出舰艇100余艘次，阻截外国商船41艘，多是欧美商船，劫夺大陆船只25艘，机帆渔船200多艘。

对于国民党的阴谋，新中国也开始做应对准备，想尽办法突破封锁。早在6月17日，陈毅在市政府一次政务会议上提醒说：

国民党对失败并不甘心。他们知道上海困难，没有原料，也缺乏粮食，因为火车船只都不够。没有棉花上海 200 多万纱锭就不能开工……要注意，他们到处钻空子，肯定还会从各方面整我们！

当时上海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需进口原棉 60%，毛纺业的毛条全部要进口，面粉业所需小麦全部靠进口，造纸业所需纸浆也靠全部进口。卷烟业所需的烟纸、烟丝一半以上要靠进口，上海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有一半也是靠进口。此外，动力生产所用的 80% 的油料和 20% 的煤等等，都需进口。

依赖进口的还有许多生活消费品。国民党的封锁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 5000 吨，粮食储备只有 4000 万斤，只够市民半个月的用量。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使上海一片狼藉。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 3 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恐慌。

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

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将汽油、柴油等其他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

的消耗。

有的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这样改装的 40 多辆公共汽车走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中国造成的困难。

当时，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 10 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 5 家发展到 100 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

这时，国际上反动势力联合封锁。帝国主义纷纷表示说：

共产党只会搞政治，只会打仗，就是管不了经济，管不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是冒险家乐园！

共产党在这里维持不了 3 个月，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上海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混乱，将导致全国财经工作失去控制。

上海经济陷入了困难，陈毅说：

这样下去，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

困难……

大家纷纷说：“怎么办？”

有的商家担心：“没有原料，我们的工厂拿什么去生产啊，敌人太无耻了！”

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这时有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说可以用他们的商船帮他们运棉花到上海，但要由对方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

工商界有人心动，跑来告诉陈毅，陈毅几乎不加思索地一口回绝了。陈毅说：

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

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决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陈毅虽然很着急，但他却很冷静，他将上海解放之初所遇到的这种困难与“长征中的困难”、“三年游击战争的困难”相提并论。

他这样说：



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

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到底该如何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呢，如果任敌人这样嚣张下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将雪上加霜。

这时，共和国领导人开始思考对策了。

周恩来命令打通珠江口

1950年的一天，北京中南海阳光明媚，周恩来伏在办公桌上埋头整理文件，这时，他见聂荣臻走进门来，就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原来，中央也十分关注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多日来，周恩来忧心忡忡，特别是听说万山守敌、舟山守敌依靠强大的舰队和匪徒封锁珠江口、长江口，让新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时，很气愤，就找聂荣臻来商量对策。

这时，周恩来面带着微笑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快坐下！”

周恩来招呼聂荣臻坐下后，警卫员倒上了一杯热气腾腾茶水，然后说：“找你来，是同你商量打破敌人海上封锁的问题。”

小小的房间里被茶水的热气笼罩着，但是聂荣臻却看到了总理脸上的忧虑，不知道会有什么任务向他交代，莫不是派海军打通航道？

两人坐定之后，周恩来向聂荣臻传达了几位常委的决策。周恩来说，中央常委们在一次会议上，分析了敌人对海上封锁所出现的情况。

周恩来说了如下问题：



由于敌人海上封锁，国内外贸易受到重大影响，闽、浙、粤对南洋、港澳的航行已经中断。通往上海、广州等地的海路很不安全，一些外轮不得不在吞吐量极小的一些偏僻小港卸载货物，致使物资大量积压，无法疏通。

为了开展必要的对外贸易，我国政府在经济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忍痛以高价租用外国轮，每月支付租金人民币 1750 亿元，指旧币，一万元旧币等于一元新币，而这些外轮仍不时遭到国民党海军的扣留和袭击。

同时，渔业生产也受到重大损失，有 50 万渔民不能出海捕鱼，被劫走渔船达 2000 余艘，被抓走渔民一万余人。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为此，常委们决定，要尽快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的重点是先打通珠江和长江的出海通道！”

聂荣臻点点头说：“明白！”

周恩来又问：“你们有什么想法？”

聂荣臻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作过研究，并拟定了一个方案。”

周恩来笑着说：“什么方案啊？”

聂荣臻说：“我回去后，根据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

再进行修改上报。”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

很快，周恩来就接到总参谋部的方案。

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个方案后，也表示同意，并嘱托要快速行动。

后来，周恩来一面敦促聂荣臻抓紧实施，另一方面又给叶剑英打电话，和他商量解放万山群岛的事情。

在电话中，周恩来对叶剑英说：“你们那里的海军力量比较弱，但是也要千方百计把万山群岛拿下来，打开珠江的出海航道，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

叶剑英表示说：“我们会立刻筹备的！”



叶剑英给洪学智交任务

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感到责任重大，不敢怠慢，他马上把江防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洪学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叶剑英向洪学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总参谋部的计划，让他们必须解放万山，从而打通珠江的出海航道，突破国民党的沿海封锁。

洪学智显得很兴奋：“是吗？太好了！”

叶剑英笑这问道：“好像你已经有了什么想法？请说说看。”

原来，洪学智对解放万山群岛早有想法。因为敌人依靠万山进行海上封锁，做了很多坏事，他早就忍无可忍了，很想给国民党一点颜色看。

当时国民党海军舰队进驻万山群岛以后，在珠江口无恶不作，敲诈勒索渔民，向来往于香港、澳门的商船要“买路钱”，死死地封锁了航道。

后来，万山岛上的敌人竟然抢劫香港拖轮“新生”号，劫去客商黄金 562 两，引起了轰动香港的一桩“海鲨诉讼案”。

作为江防部队司令员的洪学智，时刻关心着打通珠江口的事情，他已着手进行了研究，临来前，还与兵团



司令员邓华交换过意见。洪学智坐在叶剑英的身旁，端着桌子上的热水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就谈了自己的初步设想，并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珠江口的形势。

叶剑英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你回去后，先拟订一个作战方案送给我，我也要马上向中央军委写报告，待批准后再行动。”

洪学智大声说道：“是！保证完成任务。”

临走的时候，叶剑英再次强调说：“在拟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兵力，特别是要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活动情况和部署，不能打糊涂仗啊！”

叶剑英继续说道：

对我们的陆军，我很放心，只要能登上岛，敌人再多也不难解决。对于我们的江防部队，由于装备很差，又没有海战经验，所以要慎重行事，只有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情况，才能拟定对策，掩护和运送陆军登岛作战。

对于上级的嘱托和安排，洪学智铭记在心，他回去之后，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他信心百倍，决心要像解放海南岛那样解放万山群岛。

在解放军准备打通珠江口的时候，国民党也做着准备。一天，台北的天空一片阴沉。在草山脚下“士林”别墅里，蒋介石正听着桂永清关于封锁大陆的汇报。

原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于1949年6月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

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

阎锡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了封锁计划，规定了封锁范围，明确了封锁重点：华南地区以珠江口为主要对象，华东地区以长江口为主要对象。

蒋介石和美国对海上封锁寄予很大希望，1949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断言：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

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势力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已经岌岌可危，其封锁的威胁也未能改变战争的局面。

到了1950年，在海南岛等岛屿相继被解放军占领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正走向破灭，所以万山群岛成了他最后的寄托了，希望这里能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和中转站，进而封锁大陆。

为此，他决定召见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准备让他去守卫万山群岛，如果万山群岛丢失，那么国民党封锁也就破产了。

桂永清得知蒋介石要召见自己，就让司机开着车子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

在路上，桂永清还在琢磨，总裁会有什么重要任务向自己交代呢，莫不是和万山群岛有关吧。

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刚刚从舟山撤军，如今也只有万



山群岛的敌军还可以和解放继续对抗。

唉！做最后一次挣扎吧！桂永清在心里叹气道，但是他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如果总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以后肯定会得到器重，或许他还可以官复原职。

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后，蒋介石就迎面走了过来，示意他坐下，之后就跟桂永清长谈了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一些忧虑，桂永清也汇报了海军封锁大陆的进展。

蒋介石问：“率真，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桂永清报告说：“在长江口，打算增加兵力，并进行布雷，在珠江口，进一步强化万山群岛防务，我打算亲自去珠江口一趟。”

蒋介石强调说：“对，这两个方向是我们封锁的重点！就目前而言，守住万山群岛尤为重要，你亲自去一趟很有必要。”

蒋介石说完，桂永清起身告退。他刚走几步，蒋介石又把他叫了回来。

蒋介石望着窗外说：“率真，那次给你的‘撤职留任’处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决定撤消对你的处分，你就放手地干吧！”

桂永清谢过蒋介石就离开了，回到家里稍事安排，就驱车来到码头，登上一艘“太”字号护卫舰，向广东珠江口驶去。

桂永清乘着“太”字号护卫舰，来到了万山群岛垃

圾尾的马湾港。之后，他就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转达蒋介石的嘱托，并部署有关事宜。

桂永清带着自己的傲气对大家说：“我刚从总裁那里来！总裁亲自给我下达了继续封锁珠江口的指示。你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盯着几条商船，几条渔船，我们要看到广州市，看到广东省，看到整个大陆。一定要封锁大陆的航道，困死他们！”

海军顺利打通珠江航道

1950年5月24日，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即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下达了攻击万山群岛、打通珠江口的命令。

这个命令确定在5月25日发起攻击。

万山群岛位于珠江口外，有大大小小共40多个岛屿，遍布于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海面上。敌人占据在这里，也就封死了珠江口。

敌人退守万山群岛的目的是：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为此，国民党在这里部署了海军第三舰队、第四巡防处和一个巡防处、一个陆战团、一个由海匪组成的“广东突击军”，共3000余人，并设有“万山群岛防卫司令部”。

在万山群岛诸岛屿中，有一组岛屿叫垃圾尾岛。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埔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香港和澳门居其左右，是海上、空中航线的要冲。由于它所占位置的重要性，敌人的“万山群岛防卫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敌人的舰艇主力就驻泊在垃圾尾岛的一个可以停泊10多艘舰艇的港湾，即马湾，国民党就视其为“海上封锁堡垒”。

逃窜到这里的国民党残军，经常抢劫来往于香港、澳门的商船，奇袭“海上封锁堡垒”敲诈勒索渔民，无恶不作。

国民党的 800 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要解决这 3000 余残匪，要是在陆地，对人民解放军来说，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

可是，现在要越过大海去，才能消灭敌人并打通航道，这样做不但要有船、有舰艇，而且要有会操纵舰船、敢于战斗的人。

5 月 25 日深夜，解放军经过一系列准备就出发了。解放军火力舰队的“解放”号、“桂山”号、“先锋”号等 6 艘舰艇，先后分两批从广东省中山县的唐家湾起航。凌晨 4 时许，悄悄地摸进了马湾。

黑夜笼罩着港湾，那里一片寂静，只有海潮击船拍岸的“哗哗”声。透过朦胧的海雾，隐约可见有 20 多艘敌舰停泊在海湾里。果然，其中千吨以上的就有 5 艘，最小的也比“解放”号大。

指挥“解放”号的是火力队副队长林文虎，他坚定地下达了两道命令：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开进去，打他个肚里开花！”

艇长梁庭魁观察了一会儿，决定对准距离 800 米远的敌旗舰“太和”号攻击。他下令：两挺机枪打指挥台、打炮位；火炮打敌舰的舵机、油舱部。



“解放”号像只小老虎，直冲到“太和”号跟前100米处。艇上所有炮火像无数火龙向“太和”号扑去。炮手顾振华“轰”地一炮就撂倒了指挥台上的敌舰队司令齐志鸿。

“太和”号被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也中炮起火。只见两艘敌舰的甲板上一片慌乱，水兵们光着脚。提着裤子像老鼠似的东逃西窜，爆炸声中夹杂着绝望的哭喊声。有几艘炮艇顾不上解缆，就炸断缆绳仓皇外逃，有两艘炮艇还挂起了白旗。

当“解放”号等袭击马湾的时候，正按预定方案在垃圾尾岛以东海面担任侧翼警戒的。先锋号突然与敌二十五号炮艇遭遇。

这条在珠江口无恶不作的家伙，号称“海上霸王”。解放军“先锋”号虽比敌二十五号炮艇吨位大，但是火炮小，又是木壳艇。两相对比，也是敌强我弱。

敌二十五号炮艇一下没有识别出是解放军的“先锋”号，首先发信号询问。“先锋”号一面回信号迷惑对方，一面快速迎敌。

“海上霸王”慌作一团，他们也顾不得向“先锋”号瞄准，左一炮、右一炮地乱开火。“先锋”号的前后左右激起了冲天水柱。“先锋”号毫不示弱，对准敌艇的指挥台、炮位猛烈射击。敌艇长当场毙命。

当敌我两艇相距近10米时，排长商善禄一挥手喊道：“靠上去，抓活的！”

还没等两艇相靠，商善禄就端着冲锋枪跳了过去，当场击毙两人，其他几个抱头钻舱。

简善禄大喝一声：“再跑，打死你们！”

7个敌人乖乖地举起双手跪在甲板上。这时，班长孙元禄带着几个战士也跳上了敌艇。就这样，“海上霸王”连同上面的蒋军官兵，都被我方俘获。

奇袭垃圾尾的海战告捷，攻破了这座所谓“海上封锁堡垒”，减轻了敌人对珠江口的封锁，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守岛的信心，迫使其仓皇弃岛撤退。

5月27日，解放军全部占领了垃圾尾岛及其周围的牛头岛等岛屿。解放军乘胜追击，又先后解放了三门岛，外伶丁岛及其周围岛屿。

解放军顺利打通了珠江口航道，各国的商船就可以自由航行，大大缓解了新中国的经济压力。有了原料，很多工厂也开工了。

周恩来命令打通长江口

1950年的一天，打通珠江口的战役正激烈进行时，周恩来又接到上海市政府的报告。

报告说：

由于长江口被封锁，上海的经济一直处于滑坡状态……

长江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是上海港和长江流域各港口对外贸易的咽喉，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有“中国东大门”之称。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立即下达了命令：

利用海空军优势，封锁长江口，摧毁大陆经济。

敌封锁范围，几乎覆盖了东南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能够控制的全部岛屿，长江口就是其中之一，上海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

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圆圆沙、新港、横沙东北江面及南航道上布设了水雷，妄图使上海港变成一个死港，

将新中国经济扼杀在摇篮之中。

国民党《中央日报》幸灾乐祸地报道说：

上海的生产将因此日益陷入瘫痪之中，而共产党又缺乏扫雷舰及人员，使共产党政权更感到问题的复杂。长江口乌云密布，巨浪翻滚，新中国备受煎熬。

当时，偌大的江面一片萧条，商船和稍大一点的货轮基本停航，偶尔有三两艘小船通过，却不敢在主航道航行，只能战战兢兢地紧贴江岸行驶。

告急！

告急！

长江口被封锁以来，上海经济就一直不振。

1950年1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在上海某电台广播讲话说：

百货业有了东西卖不出去，机械业几乎濒于崩溃，纺织业的成本超过了卖价，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

长江口被封锁，不仅影响着上海经济的滑坡，还影响着整个国内经济的恢复。

周恩来认为，必须迅速打破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电话，叫通了南京，呼叫着华东军区。

电话通了，周恩来问道：“你是粟裕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听到是周恩来的声音，粟裕连忙说：“我是粟裕，周总理有什么要吩咐？”

周恩来介绍了当前国民党对长江口封锁的严峻形势，接着又说：“你找张爱萍同志谈一谈，要求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扫清水雷，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彻底摧毁国民党对大陆的封锁。”

粟裕在电话里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会认真安排的，一定打通长江口航道。”

周恩来说：“好，希望上海能度过眼下的难关！”



陈毅令张爱萍加快扫雷

和周恩来通过电话后，粟裕就把张爱萍叫到办公室，然后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了张爱萍。

粟裕用期待的眼光问：“这个任务艰巨，你一定要出色完成啊！”

张爱萍当即表示：“一定想办法打通！”

粟裕说：“你快去行动吧，等你的好消息！”

为了便于对部队的指挥，张爱萍就把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搬到了上海水电路 522 号。这里原是国民党的装甲兵司令部。

几天后，张爱萍被一个紧急电话召到陈毅市长的办公室。陈毅面对着墙上的上海市区图，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

一见张爱萍进屋，他便急切地问：“爱萍同志，长江口扫雷的情况进展如何？”

张爱萍回答道：“已经让孙公飞同志筹建扫雷大队，不过由于缺少器材，加上又不懂技术，困难应该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陈毅急了：“我现在不是要你汇报有什么困难，而是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把长江口的水雷给我扫清？你看，昨天又有一艘商船触雷沉没……”

说着，陈毅将一份通报递给张爱萍。

上面写道：

沉没的商船是我国租用的一艘香港商船，
载有大批从香港采购来的急需物资。

在人民海军组建初期，主要靠缴获敌人舰艇作战张爱萍可谓是海上英雄，而此刻，他心里像压了无数块铁石一样沉重。

陈毅面带忧虑地说：“爱萍同志，你们要加快进度。上海有大量物资要运出去，外面也有大量物资急需运进来。再这样困下去，恐怕连饭也没得吃了，你叫我这个市长当个什么样子嘛！”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陈毅市长也不失本色，他把双手朝张爱萍一拱：“请你转告指战员们，就说我陈毅拜托了！”

张爱萍了解老首长的性格，不是情况特别紧急，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张爱萍只好说：“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要把长江航道的水雷清理干净！”

陈毅严肃的表情舒展开，笑着说：“爱萍同志，你是海上英雄，我相信你！”

在这之前，张爱萍为了打通长江口航道已经奔波了很长时间。崇明岛以内的海匪清除以后，张爱萍就指示

司令部拟订了“打通长江口通道”的作战方案。

这个作战方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扫除长江口的水雷；二是攻占长江口外的苏南诸岛。

早在1949年12月初，张爱萍就把孙公飞和另外几个同志叫去，要求由孙公飞牵头，组建成立扫雷大队，并抓紧做好扫雷的各项准备工作。

接下组建扫雷大队的任务后，孙公飞几个人非常激动，回到教导师就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从教导师三团和侦查营抽调干部战士，从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和招商船上选调一些技术骨干，还从新参军的同志中要来一批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年，并请了两位苏联专家。

此外，他们把刚从国民党军缴获过来的“联”字号登陆舰改装成扫雷舰，很快就有了“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秋风”等舰船。

到1950年4月8日，新中国第一支扫雷舰大队就这样正式成立了。扫雷舰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是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副政委是李兰森。大队下设2个中队。

在装备上，匆匆组建的扫雷大队没有一艘正规的扫雷舰艇。扫雷编队的指挥舰是征用招商局的“中字一一一”号坦克登陆舰，将10艘25吨登陆艇用作扫雷船，仅有的4条扫雷索只能将就使用。

大队成员大多数是从陆军调来的，以前谁也没有上

过军舰，更没有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舰艇技术设备数量不多，也很落后，要以这样的条件去完成扫雷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全国刚解放，形势很好，部队士气非常高涨，具备完成新的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任务一布置下来，大队本着急学先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舰艇除了学习本部门业务知识，还组织学习航海知识和扫雷技术。他们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进行实际演练。

在请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讲课的同时，战士们发扬优良传统，开展官兵互教互学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有关航海知识和扫雷技能。

接着，他们就拉到海上进行编队训练，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提高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水平，使部队熟悉了舰艇生活，增强了适应能力。

大队成立后，孙公飞首先调查了国民党布雷的情况。据情报证实：

1950年1月，桂永清曾亲自登上一艘“永”字号布雷舰，布了大约20多颗水雷。雷区主要是在长江口南航道九段沙灯标至福庆沉船浮标一段。

周恩来和陈毅、粟裕的指示，使张爱萍更加感到打

通长江口航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张爱萍从陈毅那里出来后，就驱车来到了吴淞口的扫雷大队。他听取了孙公飞的汇报。

张爱萍急切地问孙公飞：“你们现在能不能马上出去扫雷？”

孙公飞说：“能！”

张爱萍侧身问两位苏联顾问：“你们的意见呢？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

苏联顾问：“根据现有条件，也只好这样了。”

张爱萍笑着说：“好，马上行动。”

扫雷失利商船多次触雷

1950年6月19日，朝霞映红了天，在张爱萍一声令下，从招商局征用来的“中字一一一”号坦克登陆舰作为临时指挥舰，与10艘“扫雷舰”成正三角队形，驶进了长江南航道。

到了雷区后，孙公飞等人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让10艘“扫雷舰”排成“三三四”编队，拖着长长的扫雷索前进。

长江口航道狭窄，流速非常快，加上风大浪高，扫雷舰像一只只小瓢似的剧烈地摇晃着，很多战士都晕船呕吐了。但是，一想到这是中国海军实施的第一次扫雷任务，他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纷纷下定决心打它一个漂亮仗。

这时，孙公飞站在指挥舰上，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命令各舰保持好拖带队形。编队在海面上犁出两条银灰色的航迹。

编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着。

一个来回，再一个来回。3个小时过去了……5个小时过去了……

孙公飞奇怪地说：“真是见鬼了，竟然不见一颗水雷的踪影。”



天快黑的时候，中国租用的巴拿马商船“伏虎”号，载着一批货物从入海口驶进。

战士们停止了作业，望着“伏虎”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经过雷区，全都为它捏着一把汗。

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飞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伏虎”号触雷！

孙公飞见状，马上指挥部队抢救商船。“扫雷舰”官兵纷纷扔下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海去相救。当他们将24名船员救上艇时，“伏虎”号很快就沉没了。

战士们的心里失落落的，一个星期后，孙公飞率部队再次进入雷区。水雷依然没有扫到，而在航道上航行的侨商“香山”轮再遭厄运，触雷沉没。

第一次扫雷，宣告失利！

扫雷编队回到码头的时候，张爱萍带着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长曾国晟，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获悉扫雷失败后，张爱萍马上召集大队干部开会，分析原因，总结教训。

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孙公飞及大队其他干部分析了扫雷失败的三个原因：

1、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25吨的小登陆艇犹如一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

2、自己制造的三号扫雷索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拉断了3根，也没有把水雷拉

上来。

3、部队热情虽然很高，但是缺乏技术。

当大家热烈讨论时，周恩来从北京又打来电话，询问扫雷情况。

陈毅、粟裕和肖劲光也打来电话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清扫水雷。”

张爱萍放下电话，心情感到格外沉重。但是，他希望大家沉闷的脸色，却鼓励说：“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的收获。”

张爱萍说：

熟悉了长江口航道和雷区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及雷区位置。

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扫雷技术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得到了有益的经验，学到了本领，找到了教训。

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适应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张爱萍接着说道：“同志们，只要你们认真研究一下教训和收获，进一步作好准备，扫雷就一定能成功。”

张爱萍最后表示：“我把曾国晟部长留在这里，同苏联专家一起，帮助你们解决技术上的难点。”



张爱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把第一次扫雷情况及下一步打算，专门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报告，报告中还提出从苏联进口一批扫雷具的请求。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准备期间，又发生了三起轮船触雷事件：7月20日，“新宁海”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轮触雷后被抢救回来；8月21日，“捷喜”号轮触雷沉没。

商船连续触雷事件，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而且对人民海军舰艇出海训练、作战也构成了重大障碍。

这五起船只触雷被炸事件，震惊了党中央、军委。

战士们的压力更大了，要扫除长江口水雷的决心也更大，他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张爱萍又来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他说：“必须迅速制止这种轮船触雷事件的发生！”

荣毅仁建议不要封港

一天，张爱萍来到上海市政府，同马寅初、黄敬、荣毅仁等上海财政、交通、工商方面的领导商量突破长江口的对策。

张爱萍向马寅初建议：“为了防止商船触雷事件再次发生，在海军实施第二次扫雷之前，暂时封闭长江口航道，禁止所有船只通行。”

在这以前，马寅初已经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不同意张爱萍的做法。

这时，荣毅仁首先表态说道：“上海自2月大轰炸以来，市面萧条不景气，近来略有转机，为便利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繁荣经济，长江口不宜全面封闭，我们要打通和外界的联系。”

张爱萍申述说：“过去由于不封闭，又接连发生三起商轮触雷事件。现在再不封闭，将会产生更严重后果。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也作进一步研究。”

马寅初接着说了4点不宜封港的理由：

1、上海如果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物价又会发生波动，损失就更大。

2、华东贸易部在香港购得的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以防不测。

3、北方也有大批物资急需运来上海。

4、如全面封锁航道，千万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早在8月24日，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加强长江口外扫雷工作，致函中央军委，内容如下：

据交通部8月19、21两日报告：自舟山解放后，上海港外曾连续发生伏虎、香山、新宁等轮触雷沉没事件，损失巨大。现华东海军扫雷工作时断时续，至今已停顿一个月，长江以及由沪待运北洋货物拥塞。

北洋来沪货物以青岛、连云港、营口之煤、粮、盐、棉花、石油及工业品催运尤急。据悉，青、连两埠铁路已有两三星期停拨车辆，影响江海物资交流极为严重。

查关于长江口外扫雷问题，交通部送来报告，以该项工作关系江海货运至为重要，要求迅速解决。因此特再报请军委转海司设法积极加强扫雷工作以利航运，并望将扫雷进行情况

查询示复为荷。

主任 陈云

副主任 薄一波

马寅初

李富春

1950年8月24日

张爱萍对此十分理解，他回机关后，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大家感到，全面封闭不行，不封闭也不行，是否可以寻找一个折衷方案呢。

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电话建议，采取部分封闭的办法，即对已测定的雷区基本都封闭，其余航道宁肯冒险也要通航。

接到电话后，张爱萍认为这是目前最佳方案。于是研究了采取这一方案的可能性。

长江口扫雷爆破成功

几天后，张爱萍马上把实行部分封闭长江口的意见直接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很快表示赞同部分封闭长江口的方案。

张爱萍感到这是一副千斤重担，扫雷大队每位官兵，都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些日子里，扫雷大队官兵吃不香、睡不踏实，“扫雷”成了唯一的话题。

在实行部分封闭期间，张爱萍又要求司令部采取了如下措施：

加紧进行扫雷准备，争取早日扫清航道。

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大型船只进入雷区，并防止敌特进行破坏。

扫雷期间另辟一条新航道。这条新航道在长江口南航道以南，水深3.5米，潮涨可达9米，一般船只可以出入，并不影响扫雷活动。

接着，张爱萍根据第一次扫雷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指示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们让指挥舰的“中”字号一一一舰不变，又将4艘小型步兵登陆舰改装成新的扫雷舰，以代替4艘小登

陆艇。这4艘登陆舰，排水量都为380吨，1800匹马力，时速为8至12节，特别是舰尾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

这时，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也运到了上海，立刻进行了安装。扫雷舰改装后，又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重新制定了清扫计划，进行了技术训练，开展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恐惧、疑虑以及盲目乐观的情绪。

各方也大力支援，海道测量局加修了九段、克伦浦、南汇、横沙四处测量立标，并在沉船和水底暗礁障碍物处设置了标记。

上海政府和水文、测绘等相关部门及时抽调扫雷所需船只，印制长江口雷区图纸，提供潮汐气象资料，还给扫雷部队增加了伙食补助，帮助改善生活和医疗条件，给了参战官兵以极大地鼓舞。

上海政府还考虑到出航期间可能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就决定抽调江南造船所和海道测量局的技术人员随舰工作。

为了确保扫雷区域不被敌人骚扰，陈毅命令海军组织有关单位联合清剿海匪，控制佘山岛。

佘山岛位于长江口中部，系南北航线要道口，是海匪久居之地。岛上有惯匪袁国样、施元苟部400余人，机帆船40艘，经常抢劫过往船只，无恶不作。

根据陈毅的命令，华东军区海军迅即召集有关单位



进行部署，决定长江口两岸及崇明、横沙岛一带海匪由当地陆军负责清剿；攻占佘山岛及海上清剿任务由海军负责。

华东军区海军出动舰艇 18 艘，搭载步兵两个连，于 9 月 11 日拂晓奔袭佘山。狡猾的海匪已于日前闻讯逃窜，登陆部队便留下步兵一个连驻守佘山岛，以掩护扫雷。

一切准备就绪。1950 年 9 月 11 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联名签署扫雷命令：

扫雷大队务必于 9 月 16 日开始，至 10 月 1 日国庆一周年前，必须扫除长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

这是条死命令。接到命令后，孙公飞与大队几个领导研究分工，制定各种方案。孙公飞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扫雷方案和防空袭方案，因为他们扫雷时，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飞来干扰、袭击。

9 月 21 日，孙公飞率领新的扫雷编队进入雷区。雷区分为甲、乙、丙、丁区段。4 艘扫雷舰使用 MT-3 型扫雷具，定深为 6.7 米，以梯次队形在雷区往返清扫。先是用密集队形进行清扫两次，然后用疏散队形再清扫一次。

在这期间，时有飞机在空中盘旋，敌人海军舰艇也



在外海活动，因战士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敌人飞机、舰艇未敢靠近骚扰。

9月29日，编队像往常一样清扫着。12时57分，“周村”舰的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漂浮在海面上。

突然，不知是谁第一个喊了起来：“水雷！我看到了一个水雷。”

过了一会儿，许多人也跟着大声喊了起来：“是水雷！是水雷！”

孙公飞听到喊声，就用望远镜一看，果然看见一颗水雷。他迫不及待地对着报话机，急切地报告：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现在报告，我们扫到一枚水雷啦！

听到前方的报告，整个指挥室顿时沸腾了。张爱萍对其他人说：“真是太好了！”

张爱萍马上向扫雷大队复电：

“黄河”，我代表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和全体官兵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早日扫清长江口的所有水雷！

10月11日，在丁区又扫到一枚水雷，接着又扫到第

3枚、第4枚。这4枚水雷，除一枚拆卸作研究用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岸边进行爆破。

这些水雷，与过去多次捞获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都已陈旧。从扫出的第一枚水雷上，发现上面还缠着钢索，显然是第一次扫雷时给拉断的。

这次扫雷，他们还找到了第一次扫雷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扫雷索太细。

长江口的水雷扫清了，马寅初专门给海军机关打电话：“表示深深谢意。”

就这样，长江口的水雷清除了，航道上的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了，同时，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也宣告破产。

陈毅进行反封锁斗争

反封锁斗争期间，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首先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大动员。

与此同时，陈毅领导市政府数管齐下，采取如下措施应对敌人的封锁：

其一，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产，渡过困难。

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

当时，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 300 多万斤棉花及一万纱锭的瑞士纺机搁在国外出产地运不来，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让工厂很感动。

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滞销，20 支纱每件市价只 11 万，即低于成本，陈毅就要求就以 12 万元收购。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其二，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



陈毅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

陈毅首先身体力行，当时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他坚决地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 16 名减为 6 名。

同时，从 1950 年 7 月初起，陈毅带头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领导干部这样与人民同甘苦，自然振奋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7 月份，解放军指战员省下 20 万石军粮，运来上海支援反封锁斗争，上海各界群众很受鼓舞。

其三，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

上海电厂烧油，每月要消耗 3 万吨。上海市委和陈毅积极支持工人进行锅炉大改装，以煤代油，终于将 99.7% 的燃料改为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减轻了能源的压力。

当时，耗用汽油最多的公交公司，也研究改用煤气动力牵引汽车。其间有一位朝鲜籍技术员金官奎，因忘我工作患脑溢血猝然病逝，陈毅非常惋惜，亲自交代要开隆重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不久，改装获得成功，许多因缺油停驶的汽车都挂上了煤气发生炉，奔驰在上海马路上。

其四，妥善处理经济萎缩造成的 10 万失业工人。

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捐献每月工资的 1% 用做救济。工人们表现了顾大局的政治觉悟。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 7 月中旬只有 4 成开工，到 11 月达 9 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 75%。机器工业原开工 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来了大批定货，增到 60%。

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走上了复苏。陈毅表示：

敌人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7 月 6 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

陈毅英姿飒爽地登台检阅。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

蛮横地抗拒交警干涉，引起群众公愤。

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

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一份“道歉书”。

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

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

帝国主义的封锁必将失败……

上海市民拍手称快，他们兴奋地说：“过去美国吉普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更能打破敌人的封锁！”

当然，进行反封锁斗争并非盲目排外。早在进上海前，陈毅就向接管干部们强调过这一点：

对守法外侨，我们要保护，对外商企业，依中央方针区别对待，逐步接管，时间上有先后，方法上有没收、代管代管、对价转让等几种。对于电、水、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要发动中国职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

这样做，就使接管稳妥有序，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但对跑马厅、跑狗场这些洋老板办的赌博营业又不一样了，禁止其营业，又不没收，只征高额地价税款。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吃不消了，请求将跑马厅产权无偿交给人民政府。

陈毅亲自参与设计规划，将它北边建成芳草如茵的人民公园，南边建成人民广场。同样，后来跑马场变成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建成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建成了上海展览馆。一个个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淫乐场，先后回到人民手中，化腐朽为新生。

从1950年夏天到冬天，经历了反封锁斗争，经历了三次物价大波动的考验，上海经济日渐走向康复发展之路。但华盛顿和台北却传来切齿之声，一场针对中国的又一次“禁运”风暴正在掀起。



二、打破贸易禁运

- 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 叶剑英带领中苏专家，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实地考察土地、气候及橡胶树的生长情况。
- 叶剑英号召大家说：“一粒种子，一粒黄金。种子问题很重要，一粒都不能浪费。”

新中国面临禁运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浩浩荡荡的开进朝鲜。

这时，总后勤部是最忙碌的，出兵打仗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粮食、石油、武器……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资十分缺乏。

更可恨的是，美国为了阻击中国部队出兵朝鲜，在国际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实施禁运。

1950年6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

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

30日，美国政府要求英国采取同样措施，之后又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类似要求。

7月10日，美国驻巴统代表在巴统会议上提出：既然美国已对朝鲜实行禁运，其他巴统国家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并要求巴统国家对中国实行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的贸易管制。

巴统各国在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方面起先各执己见，美国一再施加压力，有关各国遂于7月17日同意对中、朝实行像对东欧国家一样的管制。

7月18日，英国政府又向美国表示，准备把一切石油制品列入1号国际货单，并将要求新加坡、香港采取同样办法。在香港的存油将归英国海军部处理。

7月24日，美、英两国代表在巴统会议上提出，把一切石油产品，包括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列入1号国际货单，有关各国随之表示了有保留的同意。

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行列。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政府就确定了要利用经济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2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的报告时就说：

共产党既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又要重建国家，它势必寻求外援，寻求与西方的贸易，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

美国要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需要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合作。

当时，美国通知英国说：

美国准备对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实行禁运程序，并要求英国配合，尤其是严格限制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国民党在美国的封锁下加紧封锁大陆沿海，1949年6月，美国指使蒋介石集团封锁中国一切沿海城市，包括永嘉、宁波、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等。他们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驶往中国大陆港口的商船不断受到拦截和武器袭击。

1949年6月23日晚20时，埃及货船“苏伊士之星号”在长江口被蒋介石集团炮舰轰击，中弹8枚，被迫就地抛锚。次日不得不改驶日本神户。

1949年9月5日，美国驻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提议使用美国空军帮助蒋介石集团封锁和摧毁中国大陆沿海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采取的政策是：

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

1949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上海港及其航路是一危险区域，美国船只不应冒险驶往该地。

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又发出警告：

凡把船驶往国民党封锁港口的美国船主，皆可丧失其航行许可证。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48号文件又做出新指示：

禁止向中国及北朝鲜出口1A类物资，1B类物资的出口要向华盛顿报告，这些物资的出口只准用于正常的商业用途，而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1950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略物资管制办法》，被管制的范围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及化学原料物资等共达600余种，声言：

凡“战略物资”出口，必须具备许可证。

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就对华禁运问题写的一封信中称：

原则上同意应该把共产党作为苏联的卫星

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原则相一致。

1950年3月29日，美、英政府联合致电比、法、荷三国政府，要求它们在对中、朝两国贸易方面实行与对苏联一样的管制措施，美国并就此对菲律宾施加影响。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还去游说英联邦国家。

为了抗击美帝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开始赴朝鲜作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

到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2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上面规定，无论何种货物：

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需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

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

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



新中国展开反禁运斗争

针对美国的禁运制裁，新中国马上做出反应。1950年12月25日，周恩来发布命令：

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财产，并立即冻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美国公私银行的公私存款……

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和冻结在华存款的命令》。

命令宣布：

鉴于美国政府对华禁运和敌视行动，为防止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需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根据这一命令，全国各地立即行动，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清理管制，并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

1950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对外正式宣布禁止猪鬃和桐油运销美国和日本。

1950年12月1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自1950年12月15日起出口猪鬃、花生油、桐油、花生等货物一律征收出口关税。税率猪鬃为30%、花生油、桐油为10%、花生为15%。

面对美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的“禁运”，中央贸易部也制定抢救方案，规定：

在港英当局实施“禁运”前，要迅速提取已订购的“禁运”物资并尽快运往内地；输美货物，凡未完成装船的一律撤装，正运往美国途中的立应刻在港变卖提单套现；存在银行的美元外汇及时转移，并换成黄金或其他外币。

中国政府为防止“禁运”对日后业务造成损失，同

时制定了防范措施：

所有出口尽可能采用易货方式进行贸易，保障收汇安全；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禁止使用美、日、加、菲船只装运。

大量采购在香港列入“禁运”范围的物资，由于措施及时得当，成功地抢救了大量资金和大批物资，减少了国家的损失。

同时，中央贸易部在阐述中国针对美国实施的“禁运”和封锁采取的相应措施时，指出：

1950年年底，若干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冻结黄金、封锁、“禁运”等非法措施。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及人民的合法利益，除大部物资已采取易货方式进行外，结汇方式也规定得比较严格。出口货必须先交电汇，或凭提单交电汇方准出口，进口货原则上必须到达我国口岸后方准付款。

采取这种方式的意义是抵抗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封锁的自卫行动。

陈云提出反禁运的对策

1950年6月29日，中财委针对美国禁运和封锁台湾海峡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出《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指出：

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如五金器材、电料、化学药品等，以保证进口品价格平稳。

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美国对中国经济封锁的新政策及中国初步拟议的七项对策。报告说：

12月2日，美国政府下令，凡出口我国和香港、澳门的许可证一律作废，已启运的要一律停泊于美国岛屿接受检查。

我国为从美国进口而开出的购买证一律不准延期或修改

我国用美元从欧洲订货，并由美国转开购买证，美国银行一律不予转账。另外，日本亦宣布禁止向我国和港澳输出货物。

中财委报告就此分析了我国可能遭受的损失，并为减少损失提出以下对策：

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进口购买证及出口许可证。

令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

装运在途之美货，即设法转运远东其他口岸或者转售他国。

向欧洲国家及英镑区之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

在中立国的存款应即购货运回。

各地除对外易货贸易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出口许可证。

今后，在国际贸易上，国家应采取易货的办法。

陈云对美国的“禁运”、封锁及冻结中国在美资财的情况，提出了这种“易货贸易”的方针。

中国从港澳进口“禁运”的战略物资，许多的情况还是直接付外汇，而不能实行易货贸易。

因此，陈云说：“外汇对我们从秘密通道进口‘禁运’物资是不可缺少的。正是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外汇，

所以才能保证进口‘禁运’物资的资金需求。”

为渡过难关，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就外汇使用问题复电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复电指出：

我们必须掌握一定的外汇头寸，才能打击
黑市。

从长期需要看，银行至少应当经常储备外汇 3000 万美元。



毛泽东关心前线物资

1951年1月份，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从朝鲜前线回北京总后勤部汇报情况。一天晚上，毛泽东要接见他，于是，洪学智马不停蹄赶往主席的住处。

他们一直谈到23时，开始，毛泽东详细向洪学智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

洪学智说：“由于美国禁运，前线的很多物资都供应不上，战士的生活条件很差……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毛泽东听了这些，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心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

洪学智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美国的飞机沿路封锁，很难输运。”

毛泽东说：“你们想想办法嘛。”

洪学智说：“好吧。”

1951年2月2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情况。

彭德怀汇报说：

一是志愿军伤亡很大，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弱，如不迅速补充战略物资，将难以阻止敌军进攻。

二是敌机昼夜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运输很困难。

三是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经过美军飞机轮番轰炸，到处残垣断壁。所有经济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因此，志愿军所需物资装备、生活用品全部靠国内供应。

四是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广大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物资补给，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回报，就说：“看来关键问题是保障兵员、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问题。我已对恩来同志讲过，应尽快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尽快解决。”

毛泽东还说：“朝鲜地域狭长，不易大部队迂回，且筹粮困难，运输又难以保证，所以李奇微说我们是一礼拜的攻势，说我们的部队靠战士背的那点干粮和弹药打光了，就难以再打下去了。敌人把我们的供应切断，空

中封锁，一个星期就想把我们拖垮，所以，李奇微是动了脑子的。”

由此可见，物资供应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力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工作的每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并给予明确的指示及有力的支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禁运的形势更加严峻。

美国政府知道，仅仅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而无盟国的配合，禁运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与有关各国频繁接触，争取他们加入到对华禁运的行列中，一方面力图通过他把持的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

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错误决议，要求各国对美军给予一切援助，对中、朝军队勿给予任何援助。

联合国还成立了由美、英、法、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埃及、委内瑞拉等组成的所谓“额外措施委员会”，专门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2月1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联大使团，为“额外措施委员会”定下了工作原则和方案，专门讨论针对中国的切实有效的经济措施。

关于经济措施，委员纷纷抱怨：“对中国是全面禁运还是有选择的禁运更切实可行？”

“如果是有选择的禁运，是制定一个总的方针呢，还

是确定具体的货单？”

“是强制实行某种措施呢，还是实行联合国监督？如实行监督，如何实行？”

“是否应当建议各国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各国代表看法不一，但艾奇逊说，

对华禁运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

如果只有那些一般认为容易接受美国压力的国家实施对华禁运，这种影响是不能被完全感觉到的，只有联合国中所有非共产党国家都实施禁运，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制裁的道义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5月14日，在美国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额外措施委员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

5月18日，五届联大在苏联、波兰、捷克等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弃权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

决议鼓动每一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



5月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五届联大18日决议发表声明：

这是联大又一破坏联合国宪章，侵越安全理事会权限并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非法行动，美国每一个扩大战争的表示与行动，都只能凝聚中、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志。

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行的禁运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毛泽东和彭德怀很关心前线的物资补给。

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在战略物资上封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能种橡胶，中国应开辟橡胶园生产橡胶。

中苏两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相互通信研究橡胶树的种植问题，并且分别指示两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派专家组到中国协助开辟橡胶树种植园的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

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汽车是志愿军后勤部门的主要运输工具。由于敌机疯狂轰炸，道路状况差，夜间行车多，任务繁重，致使运输车辆损失严重。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敌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 60% 至 70% 能达前线，有 30% 至 40% 在途中被炸毁。

在运输汽车零部件的损坏中以汽车轮胎的损坏最为严重。根据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统计，全军运输汽车，平均每车消耗 5 套轮胎。

当时，《海关统计年报》的统计资料：

1950年进口汽车外胎12.4万个，内胎10万个；1951年进口汽车外胎23万个，内胎21万个……

贸易部计划局发布的统计资料指出：

橡胶进口数量，1949年为2.5万吨，1950年为7.2万吨，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

上述资料说明，中国需要大量的橡胶，但橡胶却是美国的禁运物资之一。

当时，中国从陆路进口轮胎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把从香港经过边境口岸进入内地的汽车，换上全新的轮胎入境，同时在车上载运原有的旧轮胎。待车进到内地后，再卸下新轮胎，换上原有的旧轮胎返回香港。

当时从陆路进口轮胎的另一种普遍应用的办法就是人挑肩扛。从香港岛运到内地，一个民工要翻山越岭，行走的速度很慢，往往需要两天。

民工在运输途中可能路过自己的家，就将轮胎放在家中休息，第二天再继续运。有的汽车轮胎又高又重，民工就把轮胎摆平，站到轮胎中心，巧妙地挑起轮胎行进。但这样的运输很难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中苏领导



才决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

毛泽东下达指示后，中共中央责成陈云负责筹建橡胶园工作。陈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开始部署橡胶种植工作。

1951年6月，陈云就橡胶种植工作向毛泽东写报告，介绍了海南岛的种植历史和现状，以及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种橡胶的可能性。

1951年7月2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电中南、华东、西南军政委员会。

致电指出：

橡胶是工业的重要原料，帝国主义国家已禁止橡胶输入我国。为此，一方面应尽可能扩大海南巴西橡胶树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必须在粤、桂、滇、川、闽等省找寻宜于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地区，并找寻其他胶树胶草。

1951年8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中财委与林垦部召开的专业会议拟订的在大陆播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1951年8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 this 计划。

叶剑英指挥种植橡胶树

195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并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挂帅，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1951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垦殖局局长。

1951年8月，林垦部起草了《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我国军队以陆军为主，所以仅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不保险，要想法在大陆培植。

1951年8月，中财委和林垦部共同召集粤、桂、滇、川省及中南、西南、华南军政委员会林业主管人员开会，研究在大陆播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橡胶树是多年生的热带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后可以割胶大约需7年的时间。中国的海南岛适宜橡胶树的种植，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零星的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在中国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经过实地调查也发现了一些橡胶树，说明广东、广西的某些地区也可以开辟橡胶园的种植。



为了组建一支橡胶科技队伍，叶剑英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国家应该号召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胶园工作。

经中央批准，中央把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两所大学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派往华南地区。

叶剑英指示：将广东懂橡胶种植技术的归国华侨动员起来，培训一下，都派到胶园担任技术人员。

叶剑英这位久经沙场的开国元勋，为了种植橡胶树，带领中苏专家及有关负责人，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实地考察土地、气候及橡胶树的生长情况。

当时，叶剑英和考察人员在徐闻县发现了老橡胶树2000多株，在茂名县发现了7株。

根据实地考察，证实了位于北纬22度以南的地区均可种植橡胶树。叶剑英将上述调查情况亲笔写信向毛泽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

1951年12月26日，叶剑英在华南垦殖局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暂时不公开种植橡胶树的事情，故报纸上也看不到我们的消息。这叫做不讲。做了不讲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件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事业。在人民民主

阵营中，苏联有一些橡胶草和人造橡胶，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没有，整个人民民主阵营都依靠华南这地方。

接着，叶剑英详细说明了橡胶在经济建设及国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我们缺乏橡胶，南洋有橡胶，帝国主义又禁运不给我们。工业没橡胶像人没有脚，走不动。没有橡胶就没有轮胎，飞机没有轮子飞不起，车子没有轮子走不动，机器没有橡胶带转不动。我们要工业化，国防要现代化，缺乏了橡胶都不成。

到1951年底，叶剑英根据专家的建议，做出了在华南垦植局下面设立橡胶研究所的决定。接着，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正式成立了。

在当时，橡胶树的种子来源十分困难，主要依靠海南岛一带原有的老胶林来解决种子问题。为了收集种子，在种子成熟的季节，他们先将胶树下的草除净，然后派战士昼夜守在树下，及时将成熟落地的种子一粒粒收集起来。

叶剑英还号召大家说：

一粒种子，一粒黄金。种子问题很重要，一粒都不能浪费。

为了将采集到的种子及时运出海南岛，叶剑英责成垦殖局在海口市设立了运种指挥部，在海口码头设立转运站，并请当地驻军支援车辆和舰艇参加抢运。

1952年1月4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苏联专家考察组关于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合浦区种植橡胶树及在某些地区试种的建议。

1952年1月11日，中财委致电叶剑英：

请华南考虑使用军队屯垦植胶问题。

叶剑英向中财委的建议，还提出了组建华南林业工程部队的实施方案。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迅速抽调了约两万名士兵，组建了林垦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和广西地区，担负起了种植橡胶树的艰巨任务。

在叶剑英、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从搜集橡胶树的种子做起，到使用军队垦殖，开始了大规模的橡胶生产，这将大大缓解前线的需求。

1952年8月20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友好会谈。

期间，斯大林兴奋地说：“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

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协定》。斯大林亲自过问橡胶的生产，并将中国生产橡胶与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相提并论，作为两件大事之一，可见当时橡胶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的程度。

事实上，抗美援朝时期，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严重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橡胶，不仅可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缓解了物资紧缺问题，还有利于国家的战略安全。

陈云化解棉花禁运危急

抗美援朝期间，棉花紧缺，陈云在会议上说：

棉花虽然增产丰收，但如果全国纱锭每周全开工6天6夜，每月需要9700万斤原棉，工厂仍缺棉花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我们需要大量棉花啊！

原来，美国对新中国的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禁止向中国出口棉花。禁运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进口货物急剧减少，最受影响的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抗美援朝开始后，前线急需纱布，为了预防被敌人轰炸出现停工的情况，因此需要先开足纱锭加工，多存纱布。

1951年5月，工厂改为每周开工五天五夜。这样，虽然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但棉花供应却跟不上了，棉花危机日益严峻。

到5月底，国内纺花库存只有1.3亿斤，其中9000万斤是保证调运和工厂混棉所需的最低限度，剩下的纺花仅有4000万斤。

照此下去，国家存棉用完，新棉收购尚无把握，全国纺纱厂将断料停工，而市场接近需求旺季，处理不好有可能发生全面经济危机。

为了克服棉花危机，陈云多次通过电报与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及各大区负责人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反复商议。

陈云说：“应当将经济手段和政治动员措施结合起来解决危机。”

陈云在主持中财委工作，采取的措施是：

节流、统购、调控、促收。

1951年5月21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代表中财委做出紧急部署，要求全国公私营纱厂6月1日至7月15日停工一个半月，上海、天津、青岛专织军布工厂仍照常开工。

7月28日，陈云、薄一波又代表中财委提出《关于解决纱厂棉花不足问题的几项措施》，要求在8至10月采取有效办法，停止各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

陈云还签署了由中财委制定的《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公司纱厂现存棉纱

棉布均行登记，停止在市场出售，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承购。

收购价格，需确切计算厂方的成本，并给以适当利润”。

公私纱厂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代纺、代织的棉纱棉布，其工缴费的规定，亦需适当。

贸易部“应根据棉纱或各种棉织品的生产和需要情况，规定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办法。各地人民政府，对纱布市场必须负责管理，取缔投机囤积，协助国营花纱布公司作有效的分配销售工作。

这样就控制了市场棉纱、棉布的销售，减少了各地自行其是对物价的冲击，从而稳定了市场。

1951年12月19日，全国合作总社向陈云的报告中总结了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由过去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头收购棉花和向棉农供应工业品的新办法。

12月24日，毛泽东肯定了该报告，对中财委批示说，报告原则上是正确的。

后来，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国终于渡过了棉花危机。



号召海外华侨反禁运

1950年5月，广州召开第一届省人代会，开始酝酿筹备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公私合营的公司，目的在于，更广泛地吸收海外华侨的大批资金，缓解美国禁运的压力，为沟通国内外物资交流而努力。

1951年2月底，经过8个月长期的酝酿和筹备工作，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决定下属8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公方，由邓文钊动员港澳爱国人士及华侨用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公私合营企业，也是一次新的尝试。邓文钊通过廖承志将此事向周恩来汇报。由于华企的成立符合当时国家需要，很快就得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获得15年的经营权。

原来，在美国实施“禁运”后，中国采取的反“禁运”重要措施是进口，由传统集中运输改变为分散“走私”的方式。

国家为了有计划的诱导必需物资进口，对于“私商”的经营，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措施。这里所说的“走私”方式是指通过秘密渠道，采用违反美国和港英当局制定的管制法律的方法，冲破美英的封锁和“禁运”为中国



进口急需的战略物资的方式。

广东是全中国华侨最多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东南亚、美洲、澳洲，拥有巨大的资金，港澳的工商界也有不少资财。有广大的华侨的支持，美国侵略者禁运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邓文钊就和过去在香港时的朋友，香港工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亲近中国的陈祖沛、黄长水、王宽诚、陈君冷等人联络，得到他们大力支持。

接着，邓文钊拉拢了澳门的何贤、马万祺，美洲的司徒美堂。

公司第一期募集到的股金就达到人民币 100 亿元，即旧币，第一届股东大会上，邓文钊被选为董事长，黄长水、陈君冷、陈鸣为副董事长，陈祖沛为执行董事兼工业部经理。

这 100 亿元资金，其中包括有国营机构、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致公党，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资金，还有暹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的资金，另有香港、澳门工商界人士的资金。

这些股东们，不但在国际市场上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又有较广泛的国际贸易关系，透过他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进出口的贸易业务。

公司成立 20 天后，他们就顺利地做了第一批 30 多亿元的进出口生意，把大批桐油输出去，购进了大批工业

原料和五金器材。

华企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为对抗美援朝和打破美英“禁运”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借助华企得到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仅轮胎一项就进口5000套。1952年抢运西药和供志愿军用的手表。

不过当时的运输是很艰难的，他们进口的物资多数是港英严禁出口的，为了抗美援朝前线冒着很大风险偷运进口的。

成立后的华企共进口了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和60万支肺炎针剂，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帮助政府打击了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由此可见，广大爱国侨商在“禁运”、反封锁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积极同各国贸易

1952年4月3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经济贸易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周恩来亲自确定了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代表人选。

原来，中国针对帝国主义实施的“禁运”，开始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在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则占52.9%，1952年占到72%。

中国从苏联、东欧进口了大量的钢材、石油、有色金属、交通运输工具和各种机器、仪器等。中国还采取许多措施，积极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会议期间，许多人士表示说：

应改变美国实施“禁运”带给国际经济关系不正常的状况！

也有的说：“这明明是冷战产物，我们不应该孤立中国，这样不利于和平的发展。”

还有的说：“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同，并不足以妨

碍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关系!”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呼吁：“各国应摆脱美国禁运政策的限制，恢复正常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社会制度相同的和不相同的世界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努力！”

中国的态度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各国纷纷表示愿意适度和中国展开贸易。期间，中国代表团分别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11 个国家的代表签订了总额 2.23 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这些贸易协定，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破坏而未能完全实行，但这表明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强烈要求冲破美国阻挠，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的愿望。

事实上，英国、法国的许多工商界人士，也一直与中国保持民间贸易关系。

针对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的“禁运”，中国努力扩展了进口渠道，如从锡兰进口橡胶，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从澳门继续进口石油制品，这样使中国急需的许多重要物资仍有大量的进口。

1952 年 10 月 4 日，中国同锡兰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协定议定：

锡兰每年卖橡胶 5 万吨给中国；中国每年卖大米 27 万吨给锡兰。

这一协定使锡兰的橡胶有了稳定的销售市场，并获得了中国物美价廉的大米，这是对锡兰经济极其有利的事情。

锡兰把橡胶卖给中国，使美国压抑橡胶价格掠夺锡兰橡胶资源的企图破产，其“禁运”政策遭到锡兰人民的强烈抵制。

美国获悉很恼火，就命令驻科伦坡大使“警告”锡兰政府，但锡兰政府并不屈服美国的恫吓，1952 年 2 月 26 日，锡兰政府外交部于发表声明称：

锡兰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请示。

接着，印度尼西亚也步锡兰之后尘，抗拒美国的“禁运”命令，提出，欢迎任何国家向印尼采购橡胶。



三、 港澳秘密支援

- 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充分利用港澳突破禁运

1950年初，中央在北京成立了香港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在香港的各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主任，叶季壮、赖祖烈等为委员。

建国后，在香港有中央和华南、华东等中央组织开办的企业和公司。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对这些企业发出指示：

在香港的财经机构要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方针。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港澳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早在1949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由西柏坡联名密电香港的刘晓、钱之光说：“香港广大华行和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

1950年夏，中央指示在香港的各家公司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合并为华润公司。

在港企业合并后，华润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

分重要。它虽然是一个公开的贸易机构，但却完成了中央交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大事，他不仅负责贸易工作，也负责政治和统战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期，华润在反“禁运”、反封锁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许多重大的进口项目均是由华润公司承担完成的。

1951年，中央还在港澳开辟秘密运输通道，冲破了美英的“禁运”、管制，为内地进口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提供了便利。

当时，华润还成立了秘密的输运公司，取名兴隆行，任务是在香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内地需要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霍英东为其供货组织运输船队。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广大的港澳爱国同胞参与了这场激烈尖锐禁运的斗争。

华南财委在向中财委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今天从西欧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运输物资到我国大部分都必须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整个航线的运输船只都在英国控制之下，我们所需的物资如东南亚的橡胶、麻袋等也在英国控制下，因此，今后我们对英国及香港的态度也必须慎重。

我们所需要物资必须通过港、澳商人将物

资设法搞回香港、澳门，然后由港、澳搞回中国内地。

1951年8月2日，中财委在《复华南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示：

目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多集中港澳地区，港澳成为今后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大港。

由此可见，港澳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重要地位，因而也说明了利用港澳的政治、地理和经贸的特殊性，对打破美国对“禁运”有重要意义。

当时，为了抢救被冻结的美元外汇和进口货物，在港企业利用香港法律与禁运条例之间的矛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50年12月7日，香港广大华行，在禁运前向美国订购的一批货由美国的总统轮船“台维斯山”运到了香港。

当货物卸到九龙仓后，广大华行凭合法的提货单去取货，但却遭到九龙仓的拒绝。

公司代表质问：“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提货，我们有合法的提货单啊？”

九龙仓的管理人员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是根据



美国总统轮船的通知行事的。”

公司代表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管理人员怯怯地说：“不清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问他们去吧！”

公司代表说：“我们一定要用香港的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的利益。”

接着，香港广大华行就此向香港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香港法院迫于法律的尊严就无奈受理了。

在初审时，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表示说：“当这批货物还在途中时，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禁运法律，所以我们根据法律，通知九龙仓拒绝把货物交给香港广大华行……”

但香港广大华行律师指出：

那套美国法律，只能在美国领土之内或对美国管辖之人、物通用，而本案中的那批货物，从‘台维斯山’卸下后，美国的法律就管不着了。如果要把那些美国法律予以扩大的话，势必将玷污干涉香港的法律……

总统轮船公司说：“我们也很无奈，只是执行国家的法律而已！”

香港广大华行律师严厉说：“不要忘记，这里是香

港，不是你们美国。”

总统轮船公司的律师支支吾吾地说：“但……”

1952年1月31日，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判决香港广大华行胜诉。获悉消息后，公司领导和员工一片欢呼。

消息传到内地，中央某领导说：“这不仅是广大华行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

总统轮船公司败诉后，香港法院责成该公司向香港广大华行赔偿经济损失46.4万元。可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不服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经过两年的反“禁运”斗争，这个官司终于以广大华行再次获胜结束。



霍英东给南光运送柴油

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立即对香港的石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内地紧缺的许多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扬。这时，霍英东获悉澳门许多家公司帮助内地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就心动了。

霍英东说：“我要突破美国的禁运，给内地运输物资，这是爱国，更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了用风帆船向澳门运输柴油的生意。

他们在朝鲜战争期间搞海上运输完全是从零开始。最初，去澳门运柴油的总共只有3个人。一位是风帆的船主，还有一位是霍英东的堂兄。堂兄干了几次，因为很害怕，就不干了。

风帆要靠风力，第一次去澳门因为没有风，船行驶了一天才赶到。这一次去澳门总共赚了几百元，霍英东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不过100元左右。

霍英东最初为抗美援朝运送禁运的战略物资，完全是生活所迫，在商言商。因为，在抗战胜利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

如今美国要对中国禁运，依靠转口贸易发展的香港

经济再次陷入了困境，很多人失业，大量工厂倒闭。为了寻找出路，很多人开始“走私”救国。因为美国的禁运本来就不合法，所以港澳同胞的“走私”就赋予时代的正义感。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是霍家的第四个孩子，家境很困难，从小丧父。他的母亲是一位刚强的女性，靠组织驳运生意挣几个钱，养活了几个苦命的孩子。

霍英东做过工人、学徒、小掌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后来远赴南海东沙岛冒险采集的“海人草”，在那里，他锻炼了自己。

霍英东从东沙岛归来后，平日帮母亲做驳运生意，同时在官箕湾经营一座规模很小的修船厂，叫王记船厂。但他并不满足这平淡的生意，他天天阅读报纸，关注港内外各方面的新闻，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当抗美援朝爆发后，他认为，改变他生命的时刻到了……

霍英东最初经常是运柴油，柴油一般装在船舱中。船舱的底部是水，油浮在水的上面。采用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需要桶，第二，外面也很难发现运送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霍英东每次运的油量不多，从外边看船吃水很浅，好像没有载什么东西，所以，不引人注目，比较安全。霍英东善于经营驳运生意并修理船只，所以能经常买到价格便宜的柴油。



霍英东去澳门前，并不知道澳门有共产党的组织，更不知道澳门的南光公司是内地在澳门设立的贸易机构。霍英东后来同南光公司建立了联系实出偶然。

霍英东很有生意头脑，他在香港当杂货铺的店员时，一下能把客人购买的 10 多种商品的价钱准确的心算出来。他不仅买货时货比三家，卖货时则价比三家。当时澳门收购汽油、柴油的公司很多，霍英东当然要比一下，看哪家给的钱多。

南光公司由于是内地设在澳门的贸易机构，实力强，为了大量收购石油一类制品，出的价格相对其他商行自然要高。

霍英东和南光公司的关系是一回生，二回熟，当有了数十次、上百次的业务联络后，自然就建立起了双方互相熟悉、互相信赖的关系。

当年霍英东赴东沙岛采集的“海人草”，是卖给澳门何贤开办的一家公司。何贤在抗美援朝时期协助南光公司大量收购各种禁运物资。

霍英东虽然早闻何贤的大名，但他那时的地位、身份是很难见到何贤的。但南光公司及何贤那时已经知道为他们经常送货的有一个叫霍英东的人。

葡萄牙澳门当局对禁运的态度“中立”，没有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葡萄牙澳门政府基本上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正是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的上述立场，使澳门成为



有利于内地购买急需的战略物资的地方，成为了突破美、英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华北、华中、华南与香港的贸易，除了直接货运而外，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

在建国后，为了支持解放海南岛及广西，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的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

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人士协助，大力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就这样，在柯正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南光公司职工人数，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70多人。公司的地点也迁到河边新街，并扩大了仓库和买了新的船只。

南光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对外公开的身份是进出口商。南光公司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工作采取了秘密工作的方式。

当时每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接收货物的是一批人，运输的是另一批人，负责联络情报的是一部分人，他们之间是相互保密的。

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记号，如挂什么样的旗都有规定，因此南光公司的船进入广州是畅通无阻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美援朝后，内地在澳门的组织的活动逐步半

公开化了。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协调。葡萄牙澳门当局还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驻澳门的代表。

南光公司收购及运送“禁运”物资的过程，采用单线联系，各管一段的秘密工作方式。接收物资的办法，一是用小船从大船上卸货，二是在仓库直接接货。

运输的办法，是由专人和专门的船只悄悄运到广州，再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参加运输护航，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

霍英东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多，并有良好的信誉，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和重视。

柯正平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
但霍英东是最值得信任的供货人。

霍英东冒险运送钢管

1950年深冬，为了缓解内地的物资紧缺，霍英东开始往澳门运送钢管。一天，他的船只驶到了公海，霍英东以为到了安全区域，绷紧的心也就放松了。

他的船在海面上平稳地行驶着，突然，霍英东远远的发现一艘机动船向他们快速驶来。

霍英东愣住了，他奇怪地说：“他们是什么人呢，莫不是海盗？”

霍英东觉得不能被对方的船发现，不然船上的货物就难保了，于是，他立刻下令加快船速。

就在这时，机动船上“嗖嗖”地射来一颗颗子弹，击中了船舱，并传来了喝令声：“你们是干什么的，快停船接受检查！”

霍英东见逃不掉，只好下令停船。这艘机动船很快靠近霍英东的木船，几个家伙跳上了霍英东的船只，野蛮地宣布将全船的货物没收。

霍英东根据这些人的着装和言语，判定他们不是港英或澳葡的巡逻艇，而是一伙海盗。

霍英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伙人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他们流落到澳门后，就组成的“大天二”，这些人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来往船只



的，成为无恶不作的强盗。

这些人甚至可以身带武器，耀武扬威地在澳门街道上横行，澳葡当局都不敢过问。“大天二”拥有国民党海军的一些舰艇和武器，有一定的实力。

霍英东的木船周围包上了钢板，可以阻挡机枪子弹的射击，但是却抵御不了“大天二”的机关炮。霍英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自己的货抢走。

那伙人走的时候还嚣张地说：“以后见你再给大陆‘走私’，就统统没收！”

霍英东带着愤怒的心情来到澳门居住的国际酒店。几天后，他发现在一艘船的货舱边，有一些人正在出卖钢管等货物。

霍英东经过仔细辨认，发现那正是自己被抢的一船货。他立刻前去理论，并称要到澳门的警署告发这伙人。售货人并不理睬霍英东的斥责，继续叫卖。

突然，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霍英东明白了，对方用枪顶住了自己的脑袋，只要那人一扣扳机，自己可就上西天了。他没有再说话，趁对方不注意溜走了。

霍英东急忙跑到澳门警署报案，但澳门警察更怕国民党的“大天二”，不敢管。没办法，他只好失落地坐船返回了香港。

霍英东说：“没想到海上运输差一点尝到‘大天二’的子弹的味道。”

澳门国民党的“大天二”的海盗行径，使霍英东感到，如果让国民党的这伙强盗掌了权，是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的。

到1951年春节前，霍英东往澳门运输“禁运”物资基本结束。原因之一是他的合伙人风帆船的船主嗜赌如命，把大家挣来的钱都输光了。

再者，霍英东自己也有船，还同许多贸易行建立了联系，除了运柴油外，还运送药品、麻包、五金、轮胎、橡胶、铁皮等。

霍英东觉得，自己的生意很多，自己可以干得更好，因此就与船主分手了，他要自立门户。



霍英东组织秘密运输

1951年，霍英东开始自主经营，他在扩展业务的同时，还组织了自己的船队。这时，他的一些亲友也相继加入他的船队，使他的船队成为在香港从事运输禁运物资的一支庞大的力量。

霍英东当时利用香港经济的萧条，买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旧船，另有几艘是从陈济棠儿子破产渔业公司里买来的。

霍英东有文化，经常阅读报纸，经常了解拍卖的消息，因此常常能中标。他又懂船，懂机器，把买来的船用发动机改装一下，大大提高了船的速度，在海上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霍英东开始通过香港蛇口为内地运输禁运物资。在当时，蛇口是深圳接收从香港运来物资的一个重要码头。

建国初期，沙头角、深圳、宝安县统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沙深宝边委领导，因此，在行政区划上，沙头角、深圳、宝安成为了一个整体。属于深圳一侧的蛇口码头，由深圳海关和华南外贸局深圳办事处直接领导。

深圳人口虽然不多，但运输行业就有100多家，这说明深圳当年运输由港来到内地的物资及出口货物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

蛇口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渔村，码头四周空空荡荡，人口很少，只有一些渔民居住在这里。霍英东的船员常常对内地人说：“我们来到蛇口，想买香烟，但连一个小杂货铺都找不到。”

当时，沙头角、深圳、宝安县地区的形势严峻。建国初期，沙、深、宝地区成为了华南的边防前哨。深圳更成为对外贸易进出口岸和对外的主要通道。

可是，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有意地安排了一部分残余武装力量部署在香港与沙头角、深圳的边界上。沙、深、宝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封建黑社会势力极其强大，是流氓活动的大本营。

也就是说，霍英东运送禁运物资不仅在香港有危险，在途中有风险，就是他运货的目的地深圳蛇口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在抗美援朝期间，沙、深、宝地区更是成为了由香港进口“禁运”战略物资的重要关口，接收了大量的“禁运”战略物资，并由此转运到内地。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

周恩来曾指示：

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
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

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接待国际人士的交际处，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

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必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要有等待收回的思想。

由于中央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所以解放军没有在香港与内地的边界陈设重兵。沙、深、宝地区就成了香港和内地打破禁运的重要关口。

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规模给内地输运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杰出贡献。

霍英东亲自指挥运输

在沙、深、宝地区，霍英东指挥 10 只船、200 多员工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物资。他亲自上阵指挥，走到哪里，那里便成为了“指挥部”。

为躲避香港警署、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霍英东经常住在香港六国酒店、杜老志酒店或圣斯酒店等宾馆。他发现可疑情形就火速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即便这样还经常遇到危险。

霍英东事必躬亲，从 200 多名装卸工人装货到发船及侦察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向，他都亲自参加，还现场指挥。他曾经指挥大船一次次地成功突破港英水警和海军的严密封锁。

霍英东指挥 10 多只船、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禁运的各种物资，他们没有星期天，员工们一个月如果能休息上两天已经很难得了。

但船员们说：“能够突破禁运为自己的祖国解决物资紧缺的问题，再累，我们也愿意干。”

还有的说：“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我们要支持！有了充足的物资，解放军就可以打击侵略者了！”

霍英东为了指挥的安全与联络的方便，酒店就成了他的“指挥部”。

因为酒店的交通便捷，安排同事吃饭，议事方便，通讯联络也方便，最重要的是躲避香港警署和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

霍英东的家经常有警察巡视，他每次回家不是前门进，后门出，就是后门进，前门出，同时还要换衣帽，让监视他的人很难掌握他的规律。

一日，有个警察突然闯进了霍英东居住的酒店，因为平白无故闯入，警察没有什么可以盘问的，就问霍英东何时起床，何时吃饭，何时外出，何时归来，把霍英东困在酒店不让他出去。

对于警察的纠缠，霍英东快受不了了，他当时有许多事要处理，没有他的指挥和命令是不能装船和开船的，接货的人更会着急。

为了让指挥工作能顺利进行，霍英东“指挥部”的地址是变化不定的。如发现警员进了酒店或其他可疑的情况，就立刻转移，有时一天换过多家酒店。

运输生意，除了每天发船是不变的，其他事情都是变化不定的。运什么货，数量有多少，押金是多少？要由接到的提货单来定。

霍英东的朋友罗湛、陈超、周和、仇景是专门为霍英东联络运输生意的经纪人。他们每天都奔走于内地贸易机构在港开办的商行之间，洽谈运输业务。

一有运输业务，朋友就马上向霍英东报告。关于运输货物的品种、数量，押金的数额，运费的比例等等，



这诸多事情在电话里难以谈清楚，也不安全。而其中的一些事项如交付押金同签订契约一样，必须要当面敲定才行。

鉴于这种情况，这几位经纪人分别到不同的商行联络，并分别向霍英东汇报。霍英东每天都要在酒店等候处理这些事务。

霍英东的“指挥部”是一个繁忙的接头处。每天在这里除了同经纪人接头外，还要同各船的船长接头，听取他们关于运输情况的报告。

船长们一面向霍英东交上昨日收货人签字的单据，一面领取新的运输任务。在接到提货单后第二天，就要将货物运到蛇口。

霍英东在同这些人见面后，还要接听各侦察艇从各处打来的电话，根据他们侦察到的警署和工商署“缉私”船只的动向，安排晚上的装货和发船等事宜。

霍英东的船队每天都要开出 5 艘船进行海上运输。在交付押金取到提货单后，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乘车尽快赶到货仓，查看待运的货物及货仓周围的情况。

货仓有公仓和私仓，有的货仓只允许白天装货，不安排夜间装货。白天装运货物，很容易被发现，公仓是港英政府存放物品的货仓，很不安全。

为了安全，霍英东就将货物转移到较安全的货仓装船。有些货物如铁皮十分沉重，不易搬运，霍英东就雇佣工人，将重的大件物品，改装成小件。从而避免被巡

逻车或密探发现。

霍英东并不是整天都待在酒店里，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指挥。霍英东手下有 10 只小船负责侦察警署和工商署的巡逻艇的位置与动向。他们还利用收音机收听英国海军、警署和工商署的电报讯号。

维多利亚港湾的海岸线总长不过 40 公里，10 只侦察船分段侦察，每只小艇要负责几公里的岸线，因为是用人力划桨，侦察一遍需要很长时间。

各侦察船在完成侦察工作后，就近寻找打电话的地方，将侦察的情况，先报告分管侦察工作的霍锦图，然后由霍锦图汇总后再报告给霍英东。

霍英东在听完各处侦察结果的电话后，马上赶到货仓指挥装货。在驱车到货仓的途中，他还要绕香港岛和九龙的主要街道察看一下警署和工商署的动静。

装货结束后，霍英东要亲自坐上小艇在维多利亚港湾侦察一遍，直到确定警署、工商署及海军巡逻船只的位置，没有可疑情况后，他才指挥货船通过鲤鱼门驶向公海，开往蛇口和澳门。

就这样，霍英东在从事海上运输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头至尾不分昼夜发船上千次，其中每艘货船的具体事宜，他都亲自过问。

霍英东感慨说：“海上运输充满危险，每个重要环节都必须亲自过问和决策。”

霍英东亲自上阵的最大特色是不惧风险和困难，哪

里风险最大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亲自指挥拖船，在白天从港英海军的舰艇旁通过，运送“禁运”物资驶往蛇口，从而缓解了内地物资紧缺的问题。

有一日，霍英东的一艘船满载“禁运”物资，在海面上行驶着，这时英海军的一艘舰船迎面开来，船上的人十分惊慌。

霍英东命令大家不许乱动，并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结果平安通过。霍英东的勇气和胆量鼓舞了船队的所有船员，他们富于冒险的精神。

霍英东亲自上阵指挥海上运输，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善于寻找和发现通常人们不十分注意的问题，并能及时做出果断的决策。



霍英东巧妙躲避英舰艇

霍英东的船队一次次地通过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的鲤鱼门海峡，悄悄驶往了澳门和深圳蛇口，把志愿军急需战略物资运到内地。

这一运输路线是霍英东经过认真的分析、思考才确定的。霍英东分析说：“出维多利亚港湾的东西两个通道相比较，东边鲤鱼门海峡很狭窄，最狭窄处不到一公里地，港英海军严密把守，通过的时候很危险。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比较宽阔，表面上看危险性小，但西边的海域面积大，岛屿多，港英海军的舰船多，通过此处的风险也比较大。”

霍英东说：“我们还是选择经鲤鱼门海峡驶往澳门、蛇口这条路线吧。因为这里离公海比较近，只要冲出鲤鱼门很快就到了公海，港英海军就不敢管了。”

船员们纷纷说：“这个主意好！”

霍英东船队的行驶路线大致如下：

出鲤鱼门东驶进入蓝塘海峡后转向南行。从大浪湾、石澳湾以东一直往南行，有时穿过蒲台群岛的螺洲与蒲台间的螺洲门进入公海。更多的时候直接从蒲台岛的东侧南行驶进公海。

然后转向西行驶，到大屿海峡后转向北行，过伶仃洋驶入深圳湾，最后到达蛇口港。

鲤鱼门海峡最危险，但突破这一危险，其他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没有胆量和勇气，没人敢选择这一路线，但历史却选择了霍英东。

当时，英国海军舰艇的吨位远远高于霍英东的运输船。英军舰艇都配备有大口径的火炮，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停泊鲤鱼门海峡，样子很吓人。

英国海军在这里戒备森严，霍英东的船队当然不敢鸡蛋碰石头。因此，对付英国海军不能硬碰，霍英东采取了灵活的方式。

霍英东可以疏通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但英国海军却像铁板一样，假惺惺地拒绝金钱的诱惑。如何避开英国海军让霍英东伤透了脑筋。

为此，霍英东让船员们轮流休息，一连数天，他们24小时日夜不停地在鲤鱼门附近的海面上监视英国海军的动向。

他们详细记录每天在这里巡逻的船只、巡逻的路线及时间。霍英东也坐着小船在夜间来到这里，整夜地仔细观察英国海军巡逻的情况。

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了英军的规律：

一是英国海军不爱管“闲事”，对许多过往

的小船不屑一顾。

二是每天夜间在这里巡逻的舰船到了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

此外，船停靠一处抛锚，舰上的官兵统统睡大觉去了。

霍英东根据英国海军的巡逻时间和路线，巧妙部署了装船的时间和开船的时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上半夜装船，船装完后在距鲤鱼门较近处等候。这时，许多船员移到另一艘大船，驶到另处，假装是这艘船出海，用这一方法终于甩掉了英军。

霍英东还在鲤鱼门附近设立了一处“货仓”，此处“货仓”并不储货，而是船队在遇上港英的巡逻艇检查时，骗英军他们要在这里卸货。

英军检查时，霍英东就乘小船到鲤鱼门海峡一带观察动向，当发现英海军舰船停止巡逻，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开船！

道路就是这么艰难，到处都充满了挑战。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霍英东的船队，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禁运物资，为大陆解决困难。

后来，霍英东的船队不仅利用深夜英海军停止巡逻的时间偷越鲤鱼门，就算在白天，也敢从英海军舰船的船旁驶过鲤鱼门。

当时有人问霍英东：“你和你的船队为何有如此巨大



的胆量?”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历史证明，这是胆量与胆量的较量。因为耀武扬威的英国海军，天真的以为，没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所以，英国海军在白天的巡逻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对过往的船只懒得检查。

不过，如果遇到英国海军真的缉私艇的盘问，就编造一个理由说：“驶往长洲的货仓。”因为是在香港水域内航行，并不“违法”。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运送禁运物资到处是危险。

有一天，天空下着大暴雨，霍英东的船队悄悄驶往蛇口。

当霍英东安排好5艘船通过鲤鱼门后，刚刚返回货仓码头不久，那5艘船竟然又驶回来了。霍英东很奇怪，就站在码头张望。

霍英东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一位船长忧心忡忡地说：“老板，这么大的风浪，十分危险啊。”

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霍英东急切地说：“如果这5艘船白天停在海面上，肯定会引起英军的注意，如果这5艘船及货物被港英当局扣住，整个海上运输就将毁于一旦。”

霍英东根据经验判断，这样的风浪还是没有大的危险的。他立刻决定为避开风浪，改变航线，出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到公海，每船卸下 20% 的货物。

霍英东对大家说：“你们不敢开船，我来开。祖国人民需要这些东西啊！”

霍英东的坚韧和果敢，让大家敬佩万分。

由于他们从没走过西边的路线，霍英东分析后认为，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危险，特别是没有“打发”过这条路线上的检查人员，他就让船长带一些钱，准备在对方盘查时用。

一切准备好后，霍英东大声命令：“出发！”

5 艘运输船迅速开动，朝着目的地驶去。庆幸的是，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了。

霍英东登上港英巡逻车

1951年6月25日，港英当局在执行“新出入口管制法令”后，在水陆均施行严密检查。在水面上派出巡逻艇，昼夜巡逻海面。在陆上除各个缉私站加强警力外，还派出巡逻车、缉私员四处巡逻……

但港府的巡逻往往是象征性的。原来，英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是追随美国的战略伙伴，但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的“禁运”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特别是严重破坏香港的经济，危及了港英当局的利益。

禁运期间，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及新闻媒体多次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利用香港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禁运”物资。美国还扬言要对英国政府这一“援共”行为进行制裁，有的议员甚至提出动用武力制止英国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1951年5月，美国参议院先后两次向英国及欧洲其他盟国警告“勿将战略物资输共，否则减少美国经援”的议案，向英国等盟国施压。

美国参议院出口管制小组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多次发表演说，指责：

悬挂英国旗的一些船只，仍然把一些高度

战略价值的物资绕道香港运往中国。

美国的新闻媒体指责英国自朝鲜战争爆发至 1951 年 5 月，“英国输往中国的物资，数值已达 3.57 亿美元，而其中的 2.88 亿美元是经过香港运到中国去的”。

港英当局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对美国采取了两面派态度。

港英当局在表面上和美国狼狈为奸，颁布了很多“禁运”管制的法令，还派出舰艇在海面上装模作样的检查。另一方面在暗中支持英商同中国进行贸易，并亲自出马“包私出口”，从中捞取钱财。

港府的各部门从海关、工商署、政治部到负责检控贪污的“贪污部”都是查缉“禁运”物资的部门，他们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对如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都有很多办法。

所以他们带头搞起了“包私出口”的买卖。这在客观上为内地在港贸易机构开辟运输通道提供了便利，也为霍英东突破“禁运”带来了机遇。

当时，华南财委在关于《华南执行贸易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

英国政府虽然在美国压力下步步对我国加紧封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英

美间经济上的矛盾，香港本身上的财政收入的矛盾，帝国主义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矛盾，香港工商业家利益的矛盾等等，使他只能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这样就给我们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利用。

港英当局对禁运态度暧昧，常常借此捞点钱花。一日，霍英东正在紧张指挥船员装货，这时，警署巡逻车忽然赶到，就把他抓上了车。

霍英东装货的货仓一般都选择有遮掩围墙的货仓。但这一次，可能是装货的货仓外面没有遮掩的围墙，警署巡逻车发现了禁运物资。

警署警员拿着枪，野蛮地把霍英东拉上巡逻车。这些警员，敲诈勒索的经验可能不足，手段也很稚嫩。刚开车，迫不及待地向霍英东说道：“得交3万块，我们才能放了你。”

霍英东很气愤，他说道：“这批货物并不出口，只不过是这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

这些警员只要钱，而不讲理，他们嚣张地说：“少啰嗦，没钱就别找那么多理由！”

车在开往警署的途中，霍英东和那些人激烈地谈判。警员开的是一个天价，对方也很清楚要价过高，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要价。

最后，一个警员说：“3000，怎么样？”，

霍英东为了把货物运往内地，只好便宜了这些贪婪的家伙，他说：“好吧，我给你们。”

在平常，霍英东会专门让几个伙计怀中揣着钱站在一旁等候，时刻准备应付突发的事件，准备着迎接警察署、工商署、海关等方方面面的检查，按照他们开出的价码疏通关系。

巡逻车上的谈判结束后，那些人拉着霍英东回到了装货的码头，由站在那里等候的伙计付了钱。

巡逻车的警员收到钱，他们的巡逻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开着车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而这时，霍英东的一船货装好了，也整装待发。

当年，中朝同美国正在朝鲜开城板门店举行谈判，据说这一谈判地点几经周折才确定。而霍英东这次同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的谈判是在巡逻车上进行的，这一谈判地点的确定无需花费任何周折，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为的是勒索几个钱花花，可是这一谈判的地点却很有创意。

除了英国海军，在一般的情况下碰到警署的警员和工商署的“缉私”人员，他们要一些钱就走了。所以，香港对向内地“走私”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霍英东说：“怕就怕隔区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人来查。因为，港英当局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下级部门，是按地区划分的，只限在本地区巡逻。”

所以，霍英东也是按此进行防范。但是由于对方借

“缉私”机敲诈勒索的积极性太过火，所以经常越出自己管辖的区域，到处寻找目标。

霍英东说：“为了能让这些货物早些运到祖国，我只能便宜那些人了。”

霍英东每日装货的地点及货物的数量、品种在事前均是严格保密的。

搬运工人在装货前并不是在装货的货仓处等候，而是在另外的某个码头集中，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装货。在装货前，霍英东先派一只大船去接这些工人，然后再运到装货的地方。

关于装货的时间，霍英东一般尽量避开白天，而选在夜间，并要求快速装货。常常一船货要在一个钟头内装完，时间长了容易被巡逻的警员的密探、特务发现，因此，工人就拼命地装货。

为了加快装船的速度，霍英东还动员大量工人加入行动，每次装货都有上百人。美国实施禁运和管制后，香港的运输生意萧条，许多搬运工人都找不到活干。码头上、货仓旁经常坐着一排排工人等活。霍英东的生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当时，在香港的搬运工人中也有帮会的组织，搬运工人分为潮州帮、东莞帮、广州帮等，每个帮会都有工头。这些工头，都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霍英东每次运货都要派人同工头联络，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装船的场面很壮观，上百人一起行动，一排



排的身影晃动着，他们都很卖力，一个个仿佛进入了战场一般，他们知道，这样做就可以有饭吃，更可以把这些货物尽早输往内地。

当时深圳的搬运工人全部加起来才 1000 多人，可为霍英东搬运货物的香港工人却是他们的几倍，这是因为“禁运”让很多香港人都失业了。

每次装船，霍英东总是站在货仓与码头之间，一面指挥装货，一面留心货仓外马路的动静。

装货搬运的过程很紧张，霍英东的心情更紧张，提心吊胆，不知会遇上什么麻烦。而这次遇上的这辆巡逻车，有点陌生，可能是另一区的。

为了突破“禁运”，霍英东吃了很多苦，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霍英东忍痛运输货物

1951年的冬天，维多利亚港湾笼罩在一片阴霾的空气里，冷风掀起层层巨浪，重重地拍打着过往的船只，时而还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这时，霍英东像往日一样，让几个人划着小艇察看维多利亚港湾水警巡逻艇的动静，准备往内地运输货物。但他们的小艇引起了港英水警的注意。

港英艘巡逻艇马上向他们驶来，并用探照灯的刺眼光束射向霍英东的小艇。在港英水警的大声喝令下，霍英东停了船。

港英水警随即登上了霍英东的小艇进行搜查。港英水警的一个帮办，长得高高大大的，穿得也很整洁，那模样像个英国绅士。

“英国绅士”用英语向霍英东发问：“你夜间开船干什么？”

霍英东用英语回答：“我是捕鱼的。”

“英国绅士”冷笑一声说：“但是船上没有任何捕鱼的设备与工具，你怎么解释。”

霍英东笑着说：“我今天也没打算捕鱼，只是在这里过一趟不可以吗？”

这一回答显然不能令港英帮办满意，但是，“英国绅

士”找不到霍英东“违法”的任何证据。水警站在那里耀武扬威，露出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英国绅士”继续审问霍英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要骗我们！”

霍英东镇定自若，他的回答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是捕鱼的，有什么可怀疑的。”

霍英东不紧不慢地回答，激怒了那个穿着英制大皮靴的“英国绅士”，那人不容霍英东再说，一脚踹在霍英东的身上。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霍英东重重倒在地上，他感到肠子像被刀割一般疼痛，但他咬着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英国绅士”并不善罢甘休，而是轮番用他的双脚施暴，直到霍英东口吐白沫才拂袖而去。

霍英东躺在船舱里像断了气一样，好长时间动弹不了，而当他坐起来时，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觉得腹部的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这是霍英东在人生中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最剧烈的疼痛不是皮肉之苦，而是内脏的损伤。霍英东在过去一直认为日本鬼子是最可恨的人。现在，万万没想到富有绅士风度的港英水警竟然比日本鬼子的皮鞭、枪托、棍棒更凶残、更狠毒……



但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伤痛，等港英艘巡逻艇走后，他们命令返回码头去装载货物。霍英东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禁运给内地输运物资，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但危险不只这一次。1952年11月20日，这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寒风，船员们都没有准备，他们冻得都萎缩在船舱中，没有像往日那样观察海上情况。

他们的“黑猫号”停泊在阴冷的大海上，深夜袭来阵阵的寒风，有的船员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的衣服都被浪花溅湿，因此纷纷往船舱里挤。

这时，霍英东划着小艇比平日稍微晚些来到“黑猫号”停泊的海面上。他亲自侦察，并收到了其他几条侦察小艇的报告：

今天没有见到水警的二十一号缉私艇。另外，不知是什么原因九龙警署的机枪放在原有的位置未动用。

霍英东对这两点反常的情况感到十分疑惑。但是，内地现在急需这批货物，他已经没有时间再侦察了。于是，他下了开船的命令。

凌晨3时，霍英东的船队准备驶出鲤鱼门海峡。他们经常在这个时间通过鲤鱼门，因为霍英东经过多次仔细的观察，发现在凌晨3时前，英国的水兵及水警都睡

觉去了，这是出航的最佳时刻。

当“黑猫号”刚刚驶出鲤鱼门时，几个水警和工商署的几艘缉私小艇突然从一旁围了上来。水警快艇用探照灯射向“黑猫号”，勒令其停航。

“黑猫号”并没有理睬，而是继续开足马力冲向公海。这时，恶狠狠水警快艇架起机枪，把一排排子弹射向“黑猫号”。

之前，霍英东为了避免“黑猫号”出现危险就向“黑猫号”发出了红色的信号，叫船停航。但“黑猫号”船长徐木当时却加快了航速。

徐木非常明白，一旦停航，船上的货物就要被港英当局扣押，而这扣押将是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实际上等于损失了整船的货物。

徐木认为：如果货物被扣押，将对不住霍英东和其他同仁，也无法把货物及时送到内地，为了祖国，他决定继续冒险突进。他希望船尽快驶到公海，这样港英当局的巡逻艇、缉私艇就无可奈何了。

由于港英的缉私快艇从四面把他们团团包围，因此，“黑猫号”也不得不迂回前进，灵活躲避港英水警的射击和追击。

忽然，港英水警轮横向冲来，一下子撞上了“黑猫号”船尾的一侧。缉私艇与“黑猫号”在相撞时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港英缉私艇虽然很小，却是铁制的，很结实，而

“黑猫号”虽大，却是一条木船。两船在高速行驶中，产生的巨大撞击力，结果，“黑猫号”被港英缉私艇撞毁，并向一侧翻去。

“黑猫号”船上9名船员全部落水，船员胡权因被船上载运的铁管压住身体而不幸溺水身亡。祖国人民获悉“黑猫号”遇难后，非常惋惜，并深深地痛恨美英的“禁运”政策。

霍英东为内地运输物资符合香港经济的传统和原则，是合法的。只是他所做的一切，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时间里，霍英东冒险突破美英的“禁运”，给内地输运了大量的紧缺物资。

霍英东的精神与毅力，是那么伟大，共和国和人民都会感谢他的无私帮助。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著 团结出版社
- 《五十年国事纪要》余雁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陶文钊 牛军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陶文钊著 中国社科出版社
- 《抗美援朝战争史》本书编委会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 《患难之交》李敏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震撼人心的历史瞬间》樊易宇 邓生斌著 长征出版社
- 《高歌向海洋》本书编委会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台海对峙六十年》本书编委会著 中华传奇出版社
- 《共和国领袖的决策艺术》本书编委会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彭德怀传》本书编委会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 《红墙大事》张树德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